联合国 S/PV.8579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五七九次会议

2019年7月18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波波利西奥·巴尔达雷斯先生	（秘鲁）
	比利时	范弗利尔伯格夫人
	中国	吴海涛先生
	科特迪瓦	莫里科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辛格·魏辛格先生
	赤道几内亚	埃莱·埃拉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德国	霍伊斯根先生
	印度尼西亚	查尼先生
	科威特	艾哈迈德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波利扬斯基先生
	南非	马特基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伦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诺曼-沙莱女士

议程项目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加强伙伴关系，促进本国主导的成功过渡

2019年6月27日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9/540）

19-22252 (C)







下午3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加强伙伴关系，促进本国主导的成功过渡

2019年6月27日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9/540）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海地和东帝汶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海地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博奇·埃德蒙先生阁下和东帝汶立法改革与议会事务部长菲得利斯·曼努埃尔·莱特·马加良斯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世界银行脆弱、冲突和暴力问题小组高级主任弗兰克·布斯凯先生；非洲开发银行过渡国家协调办公室主任耶罗·巴尔代赫先生；担任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卡洛斯·奥尔梅斯·特鲁希略·加西亚先生阁下。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9/540，其中载有2019年6月27日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关于正在审议项目的概念文件。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鲁主席召开本次会议。

（以英语发言）

联合国特别政治任务和维持和平行动是我们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些最有效工具，但它们都是临时行动。我们正在加强关注过渡时刻，即我们的特派团重组或离开相关国家的时刻。特派团的过渡通常是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的结果。这是一个产生希望、潜力和承诺的时刻，是重新参与和重振我们决心的机会。在这一时刻，需要帮助相关国家政府自己推进解决危机和冲突根源的政策和方案，并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置于我们努力的核心地位。

但是，任务的转换也会带来风险。国际社会可能会减少对有关国家的关注。几十年来国际社会提供支持所取得的战略成果可能面临风险，冲突再起造成的生命损失、经济破坏和发展成果逆转，可能远远溢出所涉国家的边界。

我们必须从以往的例子、包括东帝汶和科特迪瓦的例子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些实例为伙伴关系和连续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因此，国家自主和前瞻性的过渡是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优先事项。随着国家当局和社区在安全和建设和平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它们需要得到振兴后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多边和双边伙伴的持续支持，以便走向持久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不可逆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并加强与国家利益攸关方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和会员国的伙伴关系，以采取集体行动确保取得成功。

联合国在过渡进程中的作用必须是全面和连贯的，并以综合全面的方式努力解决相互关联且往往顽固的冲突驱动因素：贫穷、排斥、不平等、歧视和侵犯人权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口流动加剧了这些因素。我们进行的改革进程正在促成更多的联手参与，以支持从部署维持和平或政治特派团到其发挥作用或重组的整个和平过程中的国家努力。

但是，联合国不能、也不会单独处理和平行动的过渡。许多其他机构和团体都会参与其中。我前面已经提到，政府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捐助者、国际和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民间社会、地方机构和企业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可以围绕国家确定的优先事项，汇集不同部门的想法、

专门知识和资源，以期增加巨大价值。我们支持的性质在不断变化，这就赋予我们更大的责任来开展合作和交流并参与集体努力，在这种努力中，每一方都可以发挥作用，也与成功息息相关。

今天，我欢迎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代表来到这里。在我们目睹的几个过渡进程中，他们是极其宝贵的伙伴。联合国与包括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其他组织之间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有助于避免在重组我们的存在时支助突然减少。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的模式来指导过渡进程。例如，2016年，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欧洲联盟支持中非共和国政府起草一项国家恢复和建设和平计划，捐助者已认捐222亿美元来执行该计划。

事实证明，建设和平委员会——今天该委员会主席也与我们在一起——的召集力和咨询作用可以有效地加强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一致性，并确保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长期需求。建设和平基金的过渡窗口现在涵盖特派团缩编的两年前和五年后时期。我鼓励所有会员国向这些重要资源捐款，大幅提高其能力。

今年早些时候，我将过渡工作作为联合国的整体优先事项，并特别关注几个国家的过渡背景。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国家工作队一直在与政府合作制订全面过渡战略。今年，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与政府密切协调，将其预算中的3200万美元用于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优先领域的联合活动，包括法治、人权和流离失所者持久解决办法。

在海地，自2017年设立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团以来，联合国的和平与发展支柱制定了支持法治和治理机构的共同办法。国家工作队正在最后敲定海地政府确定的优先领域一揽子项目，包括建设和平基金首次在海地资助的一些项目。我们与欧洲联盟合作，从“聚光灯倡议”中拨出12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在未来三年打击基于性别的暴力。

在哥伦比亚，我们依照政府关于支持和平进程的请求，与国家工作队密切合作，连续两次派出政治特派团。我也欢迎总部正在采取举措，提供更全面的支助。例如，和平行动部和妇女署制定了一项促进性别平等的冲突分析联合倡议，为我们在海地的综合办事处的规划工作提供了信息。

冲突后正在愈合创伤的国家可能面临紧迫和复杂的挑战，包括解除武装和安全部门改革、和解和问责进程以及反腐斗争。这些国家在政治领导、建立强大和包容的机构、法治、人权、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需要获得多方面的资助，以解决冲突的根源。过渡司法以及对严重罪行和侵犯人权行为追究责任，对于确保持久和平至关重要。我们致力于推进过渡时期司法的四大支柱：查明真相，确认所犯下的暴行；伸张正义，追究犯罪者的责任；提供赔偿，让受害者和社区因遭受的伤害得到赔偿；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实施改革，确保不再发生暴行和严重犯罪。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是在获得授权并得到加强的驻地协调员制度领导下提供多边支持的核心工具。我们各区域政治办事处还支持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任务结束后阶段巩固建设和平成果。例如，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提供的斡旋对于解决2017年总统选举后利比里亚的政治危机至关重要。

兑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意味着为那些落在最后面的人（受冲突和危机影响的国家的人民）提供帮助。联合国坚定支持各国努力在冲突后开展恢复工作，实现对和平、稳定和更美好未来的愿望。我们将继续加强伙伴关系，以提高整个和平进程的一致性和问责制。

作为回报，我敦促各方与其境内联合国特派团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保持接触，为我们共同服务的人民落实《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和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现在请布斯凯先生发言。

布斯凯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非常感谢今天有机会在安理会发言。

请允许我代表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赞扬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发挥的领导作用，特别是主席国秘鲁组织这次重要会议。

今天审议的问题——如何有效支持受脆弱性、冲突和暴力影响的国家，是我们时代的关键挑战之一。对世界银行集团来说，这绝对是我们消除极端贫困任务的核心。

过去30年来，国际社会在减少世界各地的贫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我们知道，其实在受脆弱性、冲突和暴力影响的国家，贫困正在加剧。如果一切照旧，到2030年，预计全球约50%的赤贫人口将生活在这种脆弱的环境中。此外，我们知道冲突烈度正在上升。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暴力冲突比过去30年更多，逃离冲突和暴力的人数前所未有，全世界有7000多万人被迫流离失所，人数是20年前的两倍。这些数字表明，如果我们要在2030年前结束极端贫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必须齐心协力，解决脆弱性、冲突和暴力问题。

近年来，世界银行集团大大增加了对这一议程的投资，给低收入、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局势增加了一倍的资金，从70亿美元增加到140亿美元，这是我们给最贫穷国家基金（国际开发协会）的一部分。

虽然筹资至关重要，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够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在脆弱的环境中带来积极和持久的变化，就必须改变做法。因此，我们改变了国际开发协会规定的做法，转而投资于预防；支持难民和收容社区，认识到这既是人道主义挑战，也是发展挑战；并推动私营部门在最困难的环境中投资。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扩大了我们在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关系方面的伙伴关系。请允许我赞扬秘书长在这个问题上的亲自领导。他在通报中清楚而有力地阐述了需要采取更加一致的办法，以所有行为体的互补性和相对优势为基础。

在这方面，我们世界银行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集团之间的伙伴关系（针对受危机影响情形的伙伴关系框架）坚定牢固，这实际上深化了我们在受脆弱性、冲突和暴力影响的40多个国家的实地合作。此外，我们通过所谓的联合诊断、联合恢复、建设和平评估和实地业务活动，加强了与联合国以外各种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包括非洲开发银行、欧洲联盟（欧盟）、民间社会组织和双边伙伴。

例如，针对布基纳法索日益恶化的局势，在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欧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领导下，我们目前正在与联合国充分合作，通过联合预防和建设和平评估来支持该国。这种合作至关重要，有助于探索我们如何共同支持政府努力促进和平与保持社会凝聚力，以及确保国际伙伴增加的支持与将预防、救济、恢复和发展联系起来的全面战略协调一致。

尽管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我们知道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在国际开发协会已取得进展的基础上，世界银行集团现在正在制定应对脆弱性、冲突和暴力所带来挑战的第一项战略。我们知道，在脆弱环境中提供发展支持不同于非脆弱环境，因为脆弱环境的特点是能力低、不安全并且社会契约往往破裂。

因此，我们即将出台的战略将与保持和平议程协调一致，旨在确保我们的做法充分支持最脆弱社区，并有效支持国际社会努力促进和平与繁荣。具体而言，该战略将提议根据不同的脆弱局势调整我们的干预措施，同时尊重我们作为发展行为体的任务，并与联合国及其他行为体密切合作。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我们在实地的影响，我们必须消除脆弱性的独特根源，并提供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解决方案。因此，请允许我强调我们目前集中努力的四大参与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预防。作为发展行为体，我们正在加大对预防的投资，以便在风险演变成全面危机之前更有效地应对它们。预防可以拯救生命和资源。事实上，我们从与联合国合作的旗舰研究《和平之路：预防暴力冲突的包容性做法》中了解到，在预防方面每投入1美元，未来就可以节省约16美元。因此，通过注重预防，我们可以将更多资源用于可持续发展成果，而不是持续应对紧急情况。例如，我们对尼日尔青年、妇女和牧民社区的支持就是这种做法的典范，因为我们积极帮助政府化解往往导致暴力冲突的不满情绪。

我们的第二个支柱是继续介入冲突局势，以维护重要机构并持续提供服务。例如，在也门，我们正协助联合国交付发展方案所需的超过18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方案侧重于加强能力、建设地方机构的复原力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世界粮食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和其他伙伴的基本人道主义工作充分互补。

我们与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或中非共和国维和特派团等安全行为体的伙伴关系也是在最脆弱环境中提供发展支持的关键。例如，在中非共和国，世界银行正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密切合作，通过向该国一些最不安全地区的2万多名工人提供短期就业机会，支持建设和平和提高社会凝聚力的努力，从而加强该国政权在公民眼中的存在和合法性。

第三个支柱是支持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国家摆脱长期的脆弱性陷阱。对这一努力至关重要的是，建设国家的合法性和能力，培育包容性机构，并更新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我们还通过和平行动部的领导与联合国合作，评估维和过渡的宏观经济和财政影响。在索马里，我们与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合作，在该国过渡背景下，协助联邦政府评估其安全部门的财政可持续性和公共财政管理系统的实力。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支柱是帮助各国减轻脆弱性、冲突和暴力造成的溢出效应，如被迫流离失所造成的冲击。例如，在接纳难民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约旦、黎巴嫩和哥伦比亚，我们通过支持难民和收容社区的长期发展解决方案来补充人道主义行为体的基本工作，包括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密切合作，促进建设社会凝聚力所需的政策改革。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这种做法基于我们的坚定信念，即伙伴关系对于有效预防冲突、建设复原力与维持和平至关重要。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我们才能成功地完成我们消除极端贫困的任务，而且只有通过共同的愿景，我们才能有效地支助弱势、处境不利和边缘化的群体。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布斯凯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巴尔代赫先生发言。

巴尔代赫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们代表非洲开发银行集团总裁Akiriwumi Adesina先生感谢安全理事会给我们机会参加今天的通报会。我们祝贺安全理事会，特别是秘鲁代表团组织了这次通报会，并赞扬联合国致力于加强整个非洲大陆和全球的建设和平努力。

只有有效地解决冲突的根本动因——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还是其他方面——才能建立并维持和平。世界上大多数脆弱局势都出现在非洲国家。这些是我们的利益攸关方。局势就出现我们区域。因此，增强非洲国家权能、使之逐步摆脱脆弱性，这是我们使命的核心部分。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的机构专注于确认脆弱性和冲突的根源，并通过在整个非洲建立更具复原力的经济体、体制机构和社区来解决这些根源。我们的《2014-2019年非洲应对脆弱性和建设复原力战略》一直是指导这些努力的核心。该战略侧重于以下三个主要领域，从而推动建设和平与可持续性：第一，加强国家能力并建立有效机构；第二，促进

公平获得就业和基本服务；第三，鼓励就脆弱性问题进行直接政策对话，倡导采取行动促进复原力，并建立伙伴关系以实现这些目标。所有这些对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在运作层面，我们的行动集中在两个关键支柱上：第一，增加可用于应对整个非洲大陆脆弱局势的资源；第二，加强我们的干预办法，使之更加灵活，并对脆弱局势作出反应。

在财政资源方面，我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筹资机制，我们称之为过渡支助机制。这是非洲开发基金内的一个专用减让性资金来源，有三个供资窗口。第一个窗口向面临具体脆弱性挑战的国家政府提供补充支助。第二个窗口清理欠款，以帮助各国政府重新参与，正如2007年在利比里亚和2009年在科特迪瓦所成功进行的那样。我们目前正在努力解决索马里的欠款问题。第三个窗口的目标是技术援助方案，以加强国家和区域机构的执行能力。过渡支助机制的资源对于解决国家和区域两级脆弱局势的巨大和不断变化的需求至关重要。

正如非洲开发银行集团总裁Akiriwumi Adesina先生最近在马达加斯加所说的那样，不应将脆弱性视为一种最终状态。各国都可能经历脆弱性，但它们可以摆脱，转而成为稳定、充满活力、繁荣和可抵御冲击的国家。对通过国家所主导摆脱脆弱性的行动来建设复原力的乐观态度是开发银行做法的核心。

例如，在科特迪瓦，我们与包括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其他伙伴一道，在帮助它在过去十年里成功过渡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从2008年至2017年，科特迪瓦受益于过渡支助机制所有三个窗口的资源、以及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的其他融资工具。这提供了该国摆脱破坏其经济、基础设施、体制机构和社会凝聚力的两次国内危机所需的金融和技术支助。正是通过合作伙伴，特别是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之间的强力互补，我们才得以共同努力，支助科特迪瓦成功地完成由国家所主导的过渡。

在冈比亚，在经历了20年的结构脆弱性和边缘化之后，2017年在政治调解与区域维持和平努力的支持下，由国家所主导的权力过渡取得了成功。然而，这一过渡表明各体制机构、服务、司法和国家统一都需要长期的复原力建设。自那时以来，非洲开发银行集团一直与联合国各机构、世界银行和其他伙伴合作，帮助冈比亚政府重建包容性经济，恢复对司法和治理机构的信心，并加强区域一体化。

我们将审视整个非洲大陆目前和未来的过渡时期，继续学习这些经验。最重要的是，确定早期干预的机会，并与各社区、政府和国际伙伴进行有效协调，这对于避免脆弱性循环至关重要。

然而，仅仅审视脆弱性的根源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审视，作为一个银行和一个发展社区，我们如何能够更系统地确定并加强复原力的源头，以便更好地减轻地方、国家和区域的脆弱性。

为此，我们的干预行动以一个新的数据驱动分析框架为指导，我们称之为国家复原力和脆弱性评估工具。该工具确定了国家和区域管理风险和外部冲击的压力和能力。这一框架代表着一种多部门和多层面的办法，用于确定有针对性的切入点，以期在非洲应对脆弱性，建设复原力并巩固和平。国家复原力和脆弱性评估是在开发银行集团脆弱性评估工作的基础上展开的，后者的评估有助于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为国家和区域战略和行动应对脆弱性的设计提供依据。其中几项评估是与世界银行集团等合作伙伴协调进行的。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我们作为发展行为体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努力，利用我们的工具和分析，争取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局势中发挥集体作用。

就在上周，正如我的同事弗兰克·布斯凯所说，我们与布基纳法索政府以及欧洲联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一道开展了一项全面的预防与建设和平评估。这些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应对该国境内外新出

现的安全威胁。我们的干预措施将侧重于接触最脆弱的社区，以加强经济和社会包容。

我们不能仅仅谈论在国家边界内应对脆弱性和建设复原力的问题。脆弱性日益成为区域性问题。外溢效应是非洲大陆内外脆弱性的一个主要根源。诸如不断增长的青年人口缺乏经济机会、族群冲突和极端主义、政治不稳定、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会加剧被迫流离失所和非正常移民，对各区域造成不稳定的影响。

国家、区域和国际行为体之间在人道主义-和平-发展关联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对于解决区域脆弱性的动因至关重要。例如，在萨赫勒五国集团的区域，我们与各国际组织和发展伙伴合作，于2017年建立一个联盟，以促进该区域的稳定与复原力。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说明我们如何通过加强信息共享和利用不同行为体的相对优势来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努力争取集体发展成果。作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的项目注重在农业、供水与环卫、能源与气候变化、青年就业与创业以及区域一体化等关键领域建设复原力。

建设更加一体化和更具复原力的区域经济是消除区域脆弱性工作的重要部分。非洲开发银行集团能够利用其召集权力开展政策对话，对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集团等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环境中有大量外地派驻机构的伙伴起到补充作用。将各国政府、区域行为体和发展伙伴聚集在一起来推动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会减少跨界两极化和区域动荡的风险。这包括需要采取灵活办法来鼓励私营部门投资脆弱局势，注重让妇女和青年参与经济。

在非洲开发银行期待其2020年及以后脆弱状况议程时，我们反思从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局势的工作中吸取的一些更广泛的经验教训。第一，我们指出，必须采取注重包容性政治、公民安全和正义以及更传统的人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国家建设办法。第二，我们需要长远规划，以建设能够有效应对脆弱性挑战的有能力、合法的机构。第三，有必要通过私营部门发展创造可持续就业机会和改善民生。第四，善治，尤其是通过改善公共财政管理、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和打击腐败实现的善治，是加强国家合法性的关键。

非洲开发银行集团期待在国家、区域和非洲大陆各级深化与包括联合国各机构在内的发展伙伴的伙伴关系，以期在非洲各地取得集体发展成果和建设复原力。这包括就冲突、脆弱性和建设和平等问题开展联合分析工作；扩大旨在促进和巩固善治的业务；利用公共和私营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扩大实地发展影响；巩固为应对区域挑战开展的合作和建立的伙伴关系；以及在具体脆弱情况中结合我们各自相对优势和任务授权领域，深化互补性，力求在各机构之间进行更好的分工。

我谨重申，非洲开发银行集团仍然致力于作为人道主义、和平与发展界的一部分支持国家主导的过渡和建设区域复原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巴尔代赫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特鲁希略·加西亚先生发言。

特鲁希略·加西亚先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主席国秘鲁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探讨战略过渡伙伴关系对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重要作用。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支持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

当哥伦比亚今年年初就任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时，我们把促进与主要建设和平行为体的有效伙伴关系确定为我们的优先事项之一，意在着力协助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特别是善治、促进民族和解和消除冲突根源。

在这方面，2016年关于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两项决议（安全理事会第2282（2016）号决议和大会第70/262号决议）所载提议的规模、范围和性质要求联合国在努力支持国家优先事项时不要独自行事。正如我国经历所反映的那样，联合国、国家政

府以及包括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民间社会以及相关的私营部门在内的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有效伙伴关系，对于这项重要任务中的成功举措至关重要。

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挑战在过渡背景下至关重要。和平行动一结束，当局就负有维护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首要责任。最近，和平行动与东道国政府制定联合过渡计划，在东帝汶、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情况就是如此。然而，在冲突后国家政府能力薄弱的情况下，联合规划过渡可能更加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主要利益攸关方之间强有力和协调的伙伴关系对于弥合政治、体制和财政能力差距以及防止在这些行动撤离后和平方面所取得进展出现倒退至关重要。科特迪瓦行动于2017年关闭，利比里亚行动于2018年关闭，还有过渡正在其他国家进行，这些都是好例子，说明持之以恒地努力在和平进程各个不同阶段都提供支持的重要性。

建和委的主要宗旨之一是，鉴于冲突复发风险日益增加，填补体制性和结构性能力真空，并为过渡中的国家提供支持。在过渡背景下，财政削减构成潜在风险。建设和平委员会逐步利用其召集权力来促进这种有效的伙伴关系，从而确保国际支持持续不断。例如，在利比里亚，建和委就制定国家建设和平计划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这促成建立三方框架，使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欧洲联盟得以通过对复原和建设和平工作进行联合评估来协调它们的任务。结果是，在建设和平基金的催化下建立了多伙伴信托基金。利比里亚仍然需要各种资源来实现其发展目标。

认识到建和委在支持成功过渡方面可发挥的作用，安全理事会在一些具体情况下，包括在延长任务期限和过渡之前请建和委提供咨询意见。2018年12月主席声明（S/PRST/2018/20）提及建和委在撤离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和平行动方面所提供咨询意见的增加值。同时，声明鼓励建和委在任务授权形成、审查和过渡情况下就国家建设和平优先事项提出相关建议。安理会还认识到，建和委平台可用来审议各自国家过渡方面的最佳做法。作为建和委主席，我希望在今年下半年继续执行该主席声明。

建和委的届会已成为更好地了解和平行动面临的多层面挑战的机会。他们还对受冲突影响国家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实现和平与安全这种非处理不可的挑战采取了一种更加全面的对策。

例如，在几内亚比绍，建和委就该国在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即将转型背景下，在政治、安全、发展和社会等方面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向安理会提供了咨询意见。在这方面，委员会还向安全理事会介绍了区域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看法，从而履行了为安理会提供咨询的职责。最近，世界银行和建和委进行了一次正式对话，以加强两组织之间的合作，通过其在建设和平领域的活动，向有关国家提供援助。在这次对话期间，委员会和世界银行代表团利用这个机会，在双方共同优先关注的国家加强此种合作。因此，我们赞赏世界银行代表出席本次会议，这表明，如果我们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开展工作，我们可以取得成就。

安全理事会可以利用建和委作为促进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建设和平努力一致性的平台这一能力。在安理会审议相关区域局势时，这一点尤其明显。正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如涉及各种利益攸关方的萨赫勒区域，建和委能够促进协调一致的办法。

此外，我强调，妇女和青年是建设和平进程的关键行为体，应该让他们切实参与我们的所有努力。在执行其性别战略时，委员会专门讨论了转型局势中与性别有关的问题，以及为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的举措供资的问题。

我不能不提到我国。安全理事会最近访问了哥伦比亚，这次访问与在那里开展活动的特别政治特派团有关。联合国各机构和机关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让哥伦比亚受益，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建设和

平。正因如此，我们刚刚要求将特别政治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

国家进程必须考虑到发展各种能力，使有关国家能够处理特定冲突的根源，将其消除。委员会具备独特的条件，能够向安理会提供广泛而多样的建设和平视角。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卡洛斯·奥尔梅斯·特鲁希略·加西亚部长阁下以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以秘鲁外长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代表以及担任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哥伦比亚卡洛斯·奥尔梅斯·特鲁希略·加西亚部长作了富有见地的通报。我也欢迎东帝汶立法改革和议会事务部长菲得利斯·曼努埃尔·莱特·马加良斯和海地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博奇·埃德蒙先生与会。

召开本次会议的动机是，秘鲁重视并优先考虑建立各种伙伴关系，通过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参与促进和平、发展和人权的各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促进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安理会和大会2016年通过两项决议、即安全理事会第2282（2016）号决议和大会第70/262号决议，并于2018年重申了这两项决议——安理会在秘鲁担任主席期间通过了第2413（2018）号决议，而大会则通过了第72/276号决议。根据前两项决议，我们强调，必须依靠国家机构，因为它们对这些进程负有责任，并有能力预防和解决冲突，同时就促进善治凝聚全国共识，以民众、特别是最弱势群体为重，并带头与有罪不罚和腐败现象作斗争。过去几天里，在总部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今年第一次特别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16。该目标要求我们所有人都致力于建设拥有透明和可问责机构的包容性和平社会。

我们认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努力提供了适当的普遍框架。有证据表明，若要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能够化解冲突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特别关注政治和社会包容、宏观经济稳定和诉诸司法的制度，各种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必不可少。

作为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一部分，安理会必须确保对联合国和平行动进行规划和管理，以便开启适当的过渡进程，最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为此，我们从世界各地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也知道，不存在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有必要建立创新性伙伴关系，支持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同时考虑到它们的特殊情况、需求和优先事项。

为此，必须根据其独立的标准、指标和评价参数，审议每一种局势。但是，这种审议的结果必须能够根据有关国家的发展优先事项解决冲突的根源，并建立有效机制，防止冲突复燃。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必须让各种国家行为体参与并主导本国的过渡进程。

获得妇女和青年组织的支持，并增强其权能，对于凝聚对未来的共识至关重要。本着这一精神，我要着重提及在海地所取得的进展。海地与我国同在西半球，境内曾驻有最大规模的维持和平行动。秘鲁曾有7000多名士兵在这项维和行动中担任维和人员。我们希望，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将得到加强，它进而将加强过渡进程。秘鲁和整个区域将继续支持该国实现发展和稳定的努力。

我们也注意到，东帝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自2012年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完成任务以来，该国不断加强其机构，促进发展。我们对听取莱特·马加良斯部长今天将向我们介绍该国汲取经验教训很感兴趣。

同样，还必须在国际金融机构、人道主义行为体以及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协助下，建立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将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行动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国家努力联系起来。在

这方面，我们强调世界银行应对脆弱性、冲突和暴力的战略，以及非洲开发银行推动一致、可预测、可持续地提供所需资源的工作。

同样，我们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是伴随过渡进程、促进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机构之间协同增效、为安全理事会审议提供战略指导的合适的政治平台。我们尤其强调通过建设和平基金开展速效项目的重要性，这些项目在充分的风险分析和当地民众——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参与的基础上，通过支持最有需要、最引人关注的领域，推动其主要目标，即保持该进程的合法性。

最后，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能够促进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与参与过渡进程所有阶段的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建立协调伙伴关系，直至该进程顺利结束。这将促成各行为体实现持久和平，即我们所有人渴望的最终目标。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其他成员发言。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部长先生，我们高兴地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卡洛斯·特鲁西略·加西亚先生以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所作的通报。我们感谢世界银行的布斯凯先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巴尔代赫先生的详细通报，这为今天的讨论奠定了良好基础。

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缩编或关闭的情况下确保国际援助的连续性，这对防止过渡时期再次发生冲突显然十分重要，因为在此期间尚无法保证集体努力长期取得成功。事实上，保持成果，尤其是改善成果，有时比一开始取得这些成果要困难得多。为确保正在撤出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家享有持久和平，必须为冲突后重建阶段做好适当的准备。在一些情况下，在维持和平存在撤出前就开展建设和平努力是明智之举。否则，国际社会对特定局势关注程度的下降可能被一些当事方解读成，这是为它们恢复破坏性活动亮起绿灯。

在维持和平特派团存在的初期和所有阶段，都应该考虑到特派团的撤出以及将其剩余职能移交给其他联合国实体。与此同时，全面认识特派团正在推动的政治解决也很重要，因为没有民族和解就不可能建立和维持和平。因此，在考虑特派团任务授权的时候，包括现有的建设和平目标，必须充分顾及东道国的看法。

在必要时，安全理事会可授权一个特派团协助东道国处理建设和平问题，如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以及安全部门改革。与此同时，在联合国系统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领域向各国提供援助既需要适当的协调努力，也需要合适的分工，不造成权力冲突。事实很可能会证明，在任务授权中列入一般性任务，如人权监测、性和性别问题、环境保护、发展和其他问题，是不合理的资源浪费。已经存在专门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机制来实现这些目标。

在处理人权、发展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的理论联系时，我们必须承认，仅靠发展无法保证和平，和平条件未必保证发展。因此，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到这种联系，而且要清晰、充分地理解这些进程中的差异，理解由哪个专门的联合国机构或架构来负责推动这其中的每个领域。

主席先生，在今天会议的概念说明（S/2019/540，附件）中，你相当正确地强调了各国本身根据国家自主权原则在过渡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事实上，东道国对制定和执行建设和平战略和方案负有首要责任，同时要考虑到其社会的需求。在这方面，在加强联合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在建设和平领域合作的同时，必须改善与东道国的关系。与当地群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可以相辅相成，应该得到当局协调。

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通过向各国提供建设和平援助，在联合国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既是政府间咨询机构，也是联系广泛利益攸关方的平

台。我们认为，建和委具有潜力，能够提高就两个机构议程上的具体国家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建议质量。可以根据请求向安理会提出这种建议。我们认为，委员会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向安理会传达东道国的建设和平优先事项。这在维持和平行动努力的最后过渡阶段尤其重要，有助于为秘书长的相关报告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建和委建议的附加价值和相关性十分关键，这让它们有可能被纳入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还应该指出，安理会成员总是有代表参加并积极参与建和委、其组织委员会和国别小组的讨论。为了提高安理会和委员会互动的质量，必须有效利用第1645（2005）号和第2282（2016）号决议所述的大量现有机会，我们认为这些机会已经足够。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部长先生，秘鲁把过渡问题放在安理会议程的首位，再加上你的到场，这表明对秘鲁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你们担任主席国期间最重要的事件。你将过渡问题列入议程，德国完全支持，因为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必须关注这个问题。

安理会绝不能将其工作局限于通过平息枪炮声来解决冲突根源，而是必须放眼全局。考虑过渡问题非常重要。正如秘书长在通报中所说，当维和人员离开且冲突结束时，国际社会往往不再考虑该国局势，因此看不到冲突根源是否已经消失。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过渡问题，并制定相关文书。这种文书也有助于预防冲突，我们认为预防冲突极其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解决根本问题：贫困、排斥、不尊重人权和气候变化影响等。

然而，我们当然必须确保正确进行过渡。正如我们的俄罗斯同事所强调的那样，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掌握这一进程至关重要。有时存在一种趋势——我感到在目前情况下可能正在发生这种趋势——即蓝盔部队正在撤出的建设和平道路上的国家说它们想当家作主，想让联合国离开，想重获主权。然而，我们认为，它们如果接受国际社会的帮助，将更快恢复主权。有国际社会帮助消除冲突的根源，主权会得到加强。在这方面，我谨感谢哥伦比亚大使，并通过他感谢伊万·杜克·马尔克斯总统，他在安全理事会访问哥伦比亚时表示，他希望联合国政治特派团继续在该国工作，因为该国认识到联合国参与带来的额外价值。

在解决我前面提到的根本原因时，国际社会在应对挑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要再次重申，我支持秘书长的话和为达成协调一致的“一个联合国”办法而采取的改革措施，这种办法能够通过驻地协调员制度，利用所有相关工具协助处理国家局势。安全理事会最近访问了一些地方，包括马里、波哥大和巴格达，在这些地方运用了“一个联合国”办法。

建设和平委员会极其重要，我谨感谢哥伦比亚派遣其外交部长出席今天的会议，从而通过他的出席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的重要性。还提到了建设和平基金，该基金有能力快速拨款，支持在过渡时期非常有帮助的速效项目。德国和我们来自联合王国的朋友们鼓励其他国家支持该基金，我相信我们将再次与联合王国争夺建设和平基金最大捐助国的荣誉。

关于向各国提供的帮助，我们现在有许多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和区域组织开展良好合作的例子。现在例子真是太多了——如已经提到的中非共和国，还有哥伦比亚——在这些国家，联合国在非洲联盟和（或）欧洲联盟的支持下，正在协调一致地努力改善国家局势，对此我们非常感激。我不知道世界银行的参与频率有多高，但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就在我们中间，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伙伴。

我想谈谈非洲开发银行代表就萨赫勒区域危机所说的话：我们决不能再仅仅着眼于一个国家。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即我们在萨赫勒必须采用区域视角。安理会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为萨赫勒五国集团国家提供更多支持，因为如果不首先实现整个

区域的稳定，我们将无法实现一个国家的稳定。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也相信私营部门参与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私营部门的参与，我们将无法稳定各国局势并实现本质上旨在解决根本原因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回过头来简单谈谈地方自主权问题，我们的俄罗斯同事提到了民族和解在解决冲突中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努力实现民族和解和包容性，包括妇女和青年的参与——哥伦比亚的卡洛斯·霍姆斯·特鲁希略·加西亚部长和秘鲁的Néstor Popolizio Bardales部长都提到了让妇女和青年以及民间社会参与政治对话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参与进来，以实现民族和解。我们只能通过善政、尊重法治和问责以及解决腐败来稳定局势。

最后，我谨再次感谢秘鲁将这一议题列入议程。我认为，从我们为特派团起草的第一项任务到最后一项任务，安理会必须更加系统地看待过渡——尽管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在这样做。我们必须考虑过渡问题，并作为机构不断评估各国局势，即使是在联合国维和人员撤出之后。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热烈欢迎你，欢迎你来到安理厅。

首先，我也要感谢秘书长和今天各位通报者在我们讨论中的发言。我谨感谢主席国秘鲁组织本次通报会，讨论安全理事会活动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解决当前复杂、不断变化的冲突，需要在所有三个支柱内广泛开展工作：妇女和少数群体有意义参与的包容性和平与安全进程；可持续发展与复原力建设齐头并进；以及一贯尊重人权和法治。波兰去年核可的《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共同承诺宣言》正确地强调，建设和平活动所落实的可持续和平是发展的基本条件。为此，联合国应该利用一切可用手段，包括利用维持和平，来全面解决冲突。事实证明，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在从冲突走向和平的艰难道路上帮助东道国的有效工具。在这方面，在建设和平进程的每个阶段打造与东道国的政治对话时，应考虑权力平衡，以整体方式实施，纳入从地方社区到政治高层等不同舞台上的所有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地方社区。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不让任何人掉队，为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并为预防当今世界的危机和冲突提供最佳途径。在这方面，包括政府、民间社会、学术界和企业界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为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做好准备，将想法转化为行动——惠益所有相关行为体的行动。因此，使私营部门的核心企业与国际社会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至关重要。在全面应对所有冲突后挑战特别是经济停滞方面，发展援助本身是不可持续的。只有这种方法才让我们有机会实现建设和平进程，取得预期成果。

在考虑为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汇集资源的实际选择时，我们可以考虑以混合融资的形式利用更多私人资源来促进发展。在这方面，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继续投资于产生财政资源的新方法以及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的创新工具，以便更好地界定和平与安全面临风险和威胁最紧迫的领域以及最需要国际社会帮助的领域。

最后，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维持和平行动的经验表明，政治对话、安全部门改革、民族和解、社会凝聚力、促进人权和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是消除该区域危机根源的唯一显著手段。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应继续密切参与支持转型期国家，以使它们能够应对保持和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我们有义务维护这些国家取得的成果和成就，支持围绕这些国家仍然面临的挑战开展对话。

马特基拉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会议，重点讨论加强伙伴关系，以成功实现国家自主的过渡。

我们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以及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代表所作的宝贵通报。我们也欢迎海地外交部长和东帝汶立法改革和议会事务部长。

南非赞赏秘书长所做工作以及在解决联合国系统现有差距以协助各国的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努力方面取得的进展。虽然我们认识到，确定、推动和指导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优先事项、战略和活动首先是各国政府和当局的责任，但国际社会有义务确保其协助维护和平与安全，包括通过伙伴关系促进发展，确保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解决冲突根源所必需的。

在这方面，南非继续支持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继续努力推动各国对政治、和平与安全进程发挥自主权，以求建立和平和有复原力的社会。这种社会只有在解决冲突的根源和潜在趋势之后才能实现。我们认为，支持冲突后重建和发展活动应该量体裁衣，满足具体国家的需要。这项工作要有可持续性，就需要当地自主权和主导权，同时需要妇女的切实参与，并让青年参与其中。

经过深思熟虑，我们还认为，过渡时期有效的建设和平工作必须有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参与，重点是加强联合国跨支柱协调，包括发展、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权。因此，我们重申，我们支持加强建和委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安理会考虑审查和缩编维持和平行动和政治特派团时。不过，安全理事会必须从一开始就确保维持和平和政治特派团的和平行动任务是现实的、有针对性的和灵活的，这样，特派团才能在维持和平和为建设和平进程创造支持性环境方面取得预期成果。。

安全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和东道国在定期评估和审查和平行动授权任务期间以及特派团最终撤离过程中就保持和平问题进行协商也很重要。这一做法将保证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是东道国，积极参与列出对特派团的期望，包括里程碑和时间框架。这不仅将确保和平特派团取得成功，还将为今后建设和平进程的延续奠定基础。

我们还认为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架构与区域和次区域冲突后重建和发展架构，如非洲联盟（非盟）之间的伙伴关系是有益的。建设和平委员会应战略性参与非盟冲突后重建和发展政策，政策的核心是非洲冲突后局势中的建设和平活动。必须齐心协力，以求确保制订和分享建设和平方面的良好做法，同时确保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尽管我们认识到，过渡期间建设和平活动的务实供资对于防止在特派团撤离后出现缺口是有益的，但我们重申，有必要通过分摊会费来为建设和平活动切实、持续和可预测地提供资金。只有通过这种供资，才能在长期保持开展各种和平活动。

最后，安全理事会今后考虑缩编特派团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责任不会随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最后阶段结束而结束。《联合国宪章》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放在安理会的肩上。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在各国从冲突向冲突后局势过渡时继续保持参与。我们最近在海地的工作和安理会在利比里亚过渡方面的经验是表明在维和人员离开后没有忽视相关国家的良好例子。对于现在我们议程上的一些局势，我们正在考虑缩编特派团。出于必要，在审议的时候还必须包括规划和资源，以确保各国能够可持续地向和平过渡。

德里维埃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世界银行脆弱性、冲突和暴力问题小组高级主任布斯凯先生、非洲开发银行转型国家协调办公室主任巴尔代赫先生以及哥伦比亚外交部长，他以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与会。主席先生，我还要感谢你组织了本次重要辩论会，并且邀请目前的维持和平行动东道国参会。

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过渡阶段是重要而微妙的关头，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首先，我谨欢迎秘书长提出改革维持和平和加强联合国系统在建设和平方面一致性的措施。这些改革尤其应当有助于创造条件，以便从部署行动的那一刻起就为过渡和建设和平阶段做准备。部署过渡问题专家并于今年2月发布了关于过渡进程规划的指导方针，这些也是令人欢迎的发展。

一个行动的撤出必须在预期之中，特别是通过加强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之间的协调。在这方面，我们赞扬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做出努力，以便为联合项目提供资金，为国家工作队接管创造条件。

建设和平委员会在筹备和支持过渡阶段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委员会成员组成多样，运作灵活，从而有可能进行长期对话，支持东道国制定其建设和平战略。我还要赞扬联合国警察部队以及和平行动部法治和安全机构厅开展工作，加强过渡阶段国家的善治和机构能力。

我接下来要谈第二点，即加强与国家行为体的伙伴关系问题。过渡首先意味着将责任移交给国家当局。因此，建设他们的能力至关重要。然而，除了资源和能力之外，听取东道国的优先事项至关重要。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在2017年和2018年成功实现过渡的例子向我们表明国家自主权何等重要。

要保持国家自主权，它必须有包容性，让所有和平行为体参与其中，其基础是妇女的有力参与。这种和平还意味着把子孙后代的关切和权利放在首位，因为他们将确保和平的可持续性。其中包括帮助被武装团体招募的儿童重返社会。法国一直并将继续积极处理这一问题。

任何旨在防止冲突死灰复燃的方法都必须包括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为民间社会和多元化媒体的蓬勃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以保障言论自由。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和平就很难持久。这已纳入法国2018年通过的预防、复原力和可持续和平战略，成为我国的优先事项。有鉴于此，我欢迎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为各种项目提供资金，以加强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行动。

我还想谈谈联合国与有能力对我们的努力形成补充的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必须从补充、协调和加强我们努力的角度思考此类伙伴关系。为防止刚刚摆脱危机的国家在几年后重新陷入不稳定，我们必须拿出创新性办法，以协调一致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干预。

为建设和平筹资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建设和平基金的“飞跃式增长“树立了一个范例。但是，我们必须做出更多努力，构想出创新性筹资办法，让私营部门也参与进来。法国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加强联合国与世界银行之间伙伴关系的努力。广而言之，我们还鼓励与主要捐助方建立伙伴关系，其中包括欧洲联盟以及国家层面捐助方、法国开发署。该署现有一个和平与复原力基金，其部分资金来自金融交易税。到2020年，该基金获得的资金将达2亿欧元。

与区域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显然至关重要。法国特别致力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在国际社会仍须长期处于充分动员状态的萨赫勒区域，萨赫勒联盟被视为萨赫勒五国集团在安全领域所取得成就的重要补充。几个过渡进程将很快考验我们集体妥善应对这一关键阶段的能力。我谨特别提及达尔富尔、海地、伊拉克，很快还有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失败不起。

吴海涛先生（中国）：中方赞赏秘鲁倡议召开本次会议。欢迎波波利西奥外长阁下来纽约主持会议。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通报。欢迎哥伦比亚外长特鲁希略阁下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所作发言，欢迎世界银行代表布斯凯先生和非洲开发银行代表巴尔德先生所作通报。

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结束冲突，启动国家重建，开始向建设和平及长期发展阶段转型过渡。面对新的形势和需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加强伙伴

关系，共同积极应对，提供建设性支持和帮助。中方愿就此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要坚持当事国主导原则。在冲突后国家实现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最终要靠当事国自己。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过渡期工作的重点、手段也各不相同。联合国及其他伙伴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根据其意愿和具体要求提供建设性帮助，重在提升当事国能力建设，实现自主发展。

第二，要确保维和行动与建设和平工作平稳衔接。安理会是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授权的制定者。在制定维和行动授权时，应提早规划，确保在维和行动实现预期目标时，建设和平工作及时跟进。一些维和行动授权已包括相关建和任务，应在维和行动结束后，将有关职能顺利过渡至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或政治特派团，确保维和行动和建和工作有效对接，顺利开展下一阶段任务。

第三，要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伙伴关系。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处理本地区问题上拥有独特优势，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在向冲突后国家过渡进程提供帮助时，应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加强沟通和协调，充分发挥非盟、阿盟、东盟等在本地区事务中的作用。联合国、国际社会应同有关地区组织和国家开展伙伴合作，共同帮助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冲突的根源性问题。

第四，联合国系统及国际社会应形成合力。联合国安理会、建设和平委员会、有关基金方案和国际金融机构等应根据各自授权开展工作，形成优势互补。联合国特派团、国家工作队应加强协作，发挥各自专长。国际发展机构应认真落实援助承诺，帮助冲突后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有关国家民众切实享受到“和平红利”。

中方支持冲突后国家开展重建，尽己所能帮助冲突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提供积极支持。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也积极支持在有关国家开展反恐、维和、斡旋调解、难移民、可持续发展等领域项目合作。

中方倡导在国际关系中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探索构建富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各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领域开展友好合作，使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

艾伦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今天的各位通报人。

我们知道，过渡进程对于刚摆脱危机，当时有可能重新陷入冲突，失去政治、发展、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成果的国家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些过渡进程，将其视为头等优先事项，特别是当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审查特派团缩编事宜时。

首先，我要指出，我们知道，若要使和平持久，就必须让和平在当地扎根；国家必须致力于满足人民的需求，致力于消除他们的不满，使和平有赖以维系的基础。因此，必须尽早使授权任务的执行工作与国家自主的建设和平和发展目标相一致，为过渡进程的切实进行营造有利环境。

第二，我要谈谈联合国采取综合办法的重要性。当安理会决定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时，它这样做是为了给国家行为体创造空间，通过开展政治进程恢复安全与稳定，并且/或者保护平民。虽然维和行动可以促进建设和平，但它们本身无法实现政治解决，也无法解决冲突的根源，或是帮助有关国家当局发展自身能力。因此，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在实地采取全面的办法，开展跨支柱工作，让各种人道主义、发展和建设和平行为体也参与其中。在这方面，我们敦促秘书处和联合国驻实地领导人确保秘书长3月份的规划指示得到充分执行。

第三，让我谈谈伙伴关系对于有效过渡的重要性。最重要的伙伴当然将永远是国家利益攸关方，特别是致力于建设和平的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基层组织。我们应深化实地这些伙伴关系。但是，我

还要强调与双边捐助方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欢迎来自非洲开发银行的耶罗·巴尔代赫先生今天所说的话。

我谨像其他人一样肯定建设和平委员会在支持过渡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里见到特鲁希略·加西亚外长真是太好了，当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最近见过他。在利比里亚过渡期间，建设和平委员会展现了其召集权的价值，将世界银行、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国家工作队聚集在一起，制定支持利比里亚政府的计划和分工。

今天我还非常高兴地听到弗兰克·布斯凯的发言。对于联合王国来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一个特别优先事项。脆弱、冲突和暴力问题战略是世界银行着力于脆弱环境的重要依据，其做法包括与联合国进行更好的伙伴合作，以界定消除冲突根源战略。

如果可以的话，我谨简要谈谈预计在达尔富尔进行的过渡。首先，我谨欢迎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和自由与变革力量昨天达成的政治协议，其中提出向文官领导的政府过渡的计划。这是朝着实现苏丹人民正当诉求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联合王国将支持各方努力就未决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将继续支持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和平过渡，并仍然希望国际社会将有一个愿意建设和平的合法的国家伙伴。鉴于达尔富尔的需求程度，一旦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撤离，持续的国际支助显然将是必要的。因此，我们期待收到第2479（2019）号决议所要求的有关后续机制的备选方案。在苏丹经历多年经济管理不善之后，现在显然有必要采取更加全方位的办法来处理这一局势。

最后，我谨提出一些具体想法供在推进这一议题时考虑。第一，秘书长的定期报告可更加注重成功过渡所面临的风险，并阐述联合国如何在努力使任务授权履行工作与国家建设和平优先事项步调一致。秘书长和秘书处还可在这些报告中举例说明联合国各特派团如何通过联合国各综合战略框架努力使任务授权履行工作与国家建设和平优先事项步调一致。

安全理事会可在工作层面审查使用基准情况，评估哪些做法起作用，哪些做法不起作用，以期在未来完善这一做法。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广大国际社会应考虑如何更好利用有关总体融资数据来增进我们对与过渡有关的所谓“财政悬崖”的了解。在特派团开始缩编时，我们安理会在审议期间应提出这些问题。

当安理会讨论建设和平委员会注重的国家时，建设和平委员会应考虑向安理会提供有关建设和平优先事项和挑战的一页呈件。

最后，秘书处应考虑如何让世界银行参与战略评估和规划工作。

艾哈迈德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欢迎秘鲁外交部长。我感谢他召开今天的会议。我还感谢秘书长、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代表以及以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主席身份与会的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卡洛斯·奥尔梅斯·特鲁希略·加西亚先生的通报。此外，我谨感谢海地外交与宗教事务部长和东帝汶立法改革与议会事务部长。

概念说明（S/2019/540，附件）是充当今天辩论路线图的全面而翔实的文件。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本次会议为交流看法并阐明如何加强冲突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提供及时的机会。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已有几十年的经验，有一点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那就是，过渡阶段要顺应东道国具体情况，不存在单一模式或做法。冲突的性质和特点因国而异，但必要时也须考虑到一些冲突的相似性。

安全理事会一直肯定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咨询作用，特别是在过渡时期巩固和平、恢复和重建以及维和行动撤离方面，这是开始履行政治特派团任务授权后的最微妙和最关键的阶段。因此，必须强调国家机构的作用及其对冲突周期所有节点以及维和

行动撤离的充分自主权，以确保有关各国不会再度陷入冲突。只有在强有力和胜任的国家机构的支持下，过渡才会顺利。在冲突后重建中，这些机构必须发挥根本性作用。

近些年，我们看到建设和平委员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不断增加。我谨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每年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其作用，但该委员会各国别小组主席应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安理会在延长维和特派团任务期限时应支持建和委的建议。必须保持这种势头，同时铭记实现持久和平需要承认国家自主权，因为如果与东道国开展强有力的合作，国家改革就会更加有效。

资金不可预测仍然是建设和平、维持和平与保持和平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虽然建设和平基金发挥着重大作用，但仅靠该基金的资源不足以开展所有必要的任务。因此，需要齐心协力，通过国际捐款，尤其是来自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各种基金和开发银行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的捐款，确保充足的资金。在地方层面，私营部门是重建和发展中的关键伙伴。私营部门的参与可消除诸多资金障碍，因而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

安全理事会通过其决议和主席声明确认，区域和国际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些关键组织最能够了解许多冲突及其他安全挑战的根源。安全理事会肯定这些机构在建设和平、恢复和冲突后重建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但这一作用必须加强。

最后，消除冲突根源和预防冲突至关重要，有助于避免物质和人员损失，如果我们有预警机制和调查等各种预防工具可用，则尤其如此。如果在冲突开始时正确使用这些工具，有助于我们防止冲突的升级和爆发。

范弗利尔伯格夫人（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给我们机会就过渡问题进行跨领域思考。我也感谢发言者所作的翔实发言。

谈到过渡，确实有必要提及和平行动与无数行为体之间的各级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联合国特派团缩编或结束任务及其任务和责任的移交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海地的经验表明，在开展这些进程之前必须派出评估团。此外，设有具体基准的撤出战略使我们能够从第一天就开始考虑过渡。

我们也必须确保协调整合联合国动态与区域和次区域讨论。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过渡的例子表明，可能会出现不一致。国家主导是成功的先决条件，但这首先需要国家结构存在并发挥作用。

维和特派团向下一阶段的过渡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关键的是能力建设。这种过渡主要涉及将职责移交给东道国当局。为了进行有效移交，所有联合国支柱——和平与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权——都必须参与进来。

预算需求很重要，开发银行必须为过渡期的国家提供支持。我欢迎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做法，它们将具体战略和更多资源用于脆弱和冲突局势。此外，通过与私营部门建立双边伙伴关系，也能够受益于其他类型的专门知识。治理工作，包括安全部门改革，对于维持和平、重新打造强有力的社会契约以及酌情为维和特派团的撤出战略奠定基础也至关重要。

要成功实现可持续的过渡，需要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比利时和欧洲联盟采取全面和综合的办法对待联合国在实地的行动，考虑冲突的整个周期和联合国的各种行动体。除安全部门改革之外，组织自由公正的选举、刑事司法系统和过渡期司法、教育和包容最弱势的群体也在过渡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最后，转型期国家当局不应忽视其他冲突因素，如争夺自然资源。这些问题往往超越国界，并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

联合国仍然是转型期国家的重要伙伴。全面实施联合国系统的各项改革，包括管理改革，将有助于优化这种伙伴关系；资金也必须得到保证。

最后，我谨赞扬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建设和平基金的工作。比利时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是整合联合国各支柱和努力有效发挥协同作用的榜样。它资助的项目表明，弱势群体重新融入经济生活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建设和平。该基金必须扩大其支助基础。比利时呼吁各会员国增加对该基金的捐款，并且我们主张加强该基金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要成功过渡到持久和平，需要用连贯和全面的办法来加强国家当局的自主进程。

主席先生，我们谨再次感谢你召开本次通报会。

诺曼-沙莱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从维持和平成功过渡到建设和平，对于维护全世界的持久稳定与安全至关重要。我谨感谢秘书长对建设和平倡议的领导，以及他今天早些时候提出的宝贵观点。我也要感谢特鲁希略·加西亚部长、弗兰克·布斯凯和Yero Baldeh在今天这场重要辩论会上的重要发言。我们也欢迎海地和东帝汶的各位部长。

联合国有14个现役维和特派团和11个现役政治特派团。这些特派团的目标都是缩编和结束任务，我们最近在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以及之前在东帝汶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经验表明，高效和有效地管理过渡进程可能是一项重大挑战。

我今天将讨论三点：国家主导的成功过渡的关键因素、妇女在这些过渡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海地的情况。

由东道国主导并获得会员国、区域组织和联合国本身全力支持和伙伴关系的过渡最有可能促进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规划和沟通，以及独特和可实现的基准，也是这一进程的关键要素。要成功实现过渡，需要进行重要的预先规划，并需要在包括东道国政府、安全理事会、区域行为体、秘书处和民间社会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进行沟通。为此，美国坚持认为，每个特派团都必须有明确的撤出战略，这是其维和原则之一。在特派团存在周期内持续就撤出战略进行接触，可确保过渡规划尽早得到考虑、讨论和谈判。

过渡期的基准是用于确保包括东道国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履行有助于确保持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的关键指标。独特和可实现的基准提供必要的透明度和问责，确保东道国完全有能力在没有联合国支持的情况下实现独立自主。

妇女也必须在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的过渡中发挥更有意义的作用。支持女性和平与安全专家是一个很好的开始。2018年，和平行动部和联合国妇女署开展试点，将性别问题纳入了特派团的冲突分析工作，为利比里亚、海地和达尔富尔的过渡和缩编提供信息。这帮助东道国和联合国更好地了解了妇女在特派团从维持和平转向建设和平时的需求。联合国过渡和撤出的基准应确保根据特派团任务规定，纳入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以及性别平等的独立措施。美国将继续倡导在任务中优先进行战略评估，包括对妇女的需求进行专家评估。

10月，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将取代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特派团。联合国在海地的维和存在在超过15年后结束任务并向政治特派团过渡，是该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旦完成，我们希望能够把海地树立为国家主导的成功过渡的榜样。

正如安全理事会一再指出的那样，消除海地不稳定的根本驱动因素是该国政府的首要责任。过渡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地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进展，包括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海地国家警察不断专业化、减少族群和帮派暴力、保护人权和司法部门改革。

美国仍然致力于海地的未来，海地政府必须抓住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带来的机会。除让海地

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包括让妇女充分和有效参与外，海地政府还必须继续与联合国和国际伙伴密切合作。这样，海地可以为繁荣和成功的未来奠定基础。

过渡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变化和不稳定的时期。不过，通过认真的规划和沟通、明确的基准和妇女的切实参与，我们能够推进和平、安全和稳定事业。

辛格·魏辛格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欢迎波波利齐奥·巴尔达雷斯外交部长、埃德蒙德外交部长以及莱特·马加莱斯部长来到安全理事会。

我们热烈祝贺秘鲁共和国召开今天的会议和再度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也欢迎通报人准确和详细地介绍了情况，使我们得以在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上得到启发。我们还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系统采取的建设和平行动，以及文职、军事和警察人员在冲突中国家开展的辛勤工作。

维持和平特派团过渡到另一类特派团，这必然意味着大规模削减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为使这种削减不妨碍所取得的进展，采取一切必要行动都必须基于对问题根源以及国家承担即将撤离特派团先前所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如果一个国家除机构能力之外，还缺乏特定经济、政治和安全条件，特派团的撤出将造成高风险局面，在最坏的情况下，将导致过去的灾难性局势重演。我再说一遍：如果一个国家除机构能力之外，还缺乏某些经济、政治和安全条件，特派团的撤出将造成高风险局势，在最坏的情况下，将导致过去的灾难性局势的重演。

为向政治特派团移交职责，需要适当关注应对安全和治理等重大挑战的不同选项，以确保有效过渡。过渡的最后期限应该是认真进行政治和行动评估的结果，尤其注重平衡政治需求、财政压力和保持和平等因素。政治特派团必须直接参与创造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举措所需的国家能力。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提高最脆弱地区的生活水平，后者至关重要。这是解决暴力和不稳定造成的社会问题根源的关键一步。

过渡期需要采取的行动包括适应东道国的需求和妇女和青年等弱势群体的融入等，这些群体是重要的，他们既是变革的推动力，又是保持和平的力量。此外，我们必须促进与联合国系统有关联的联合行动。此外，必须强调，支持和平与发展的方案需要充足资金，此外不应忘记，在某些政治不稳定时期应允许有适当灵活性。

在经济可持续性方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通过各项举措来执行基本任务。这些实体通过其技术援助方案、司法改革项目和社会凝聚力政策，确保东道国有维护和平的能力和资源。信托基金是引导资金流向紧急项目和为冲突后阶段提供必要预算支持的有用工具。我们还必须加强联合国、双边和国际捐助方、多边金融机构以及私营部门之间的联合战略联盟。

此外，对我国代表团来说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造成的脆弱性，这是许多冲突地区共有的。一些国家的特点是生态系统脆弱，这造成岌岌可危的局面，导致人们流离失所，威胁和平、稳定和安全。这些是在制订撤出战略时需要考虑的诸多挑战中的一些，由此来避免冲突升级和重现。我们认可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出色工作，主张它与安全理事会加强合作。

我们的核心关切是，应给予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应有关注。我们必须利用安全理事会的召集力，使关键行为体和战略联盟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例如，非洲联盟提供了一个环境，确保国家一级采取的举措具有一致性，并且为定期交流信息创造条件。

和解是建设可持续和平的一个关键目标。它无疑有助于防止再次陷入暴力，因为它帮助创建社会中的人际和群体关系以及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我们认识到，情况并非千篇一律，因此每个社

会在分析冲突性质及其过渡特点时必须考虑到其具体情况。

最后，为解决当前的结构性冲突，我们必须朝冲突中国家的恢复、重新融入和重建方向进发，这是它们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唯一办法。此外，必须保证公民在各级参与促进公平和防止暴力的政治和经济进程。最后，我们呼吁加倍努力，以便找到使各国政府能够建立强有力国家机构的政治和财政解决方案，这些机构是持久和平的有效保障。

埃莱·埃拉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国秘鲁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还热烈欢迎今天莅临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各位部长，以及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建设和平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代表。

必须重新设计全球维持和平努力，以求有效应对今天的冲突及其根源。现有冲突错综复杂、持续时间长，并且与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相关联，因而有必要投入资源重组联合国架构，支持各国加强世界和平的努力。在这方面，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赞扬古特雷斯秘书长努力确保政治和业务一致性并计划改进联合国的领导作用、问责制和能力，以支持这一重要议程。

我们特别同意，投资于全球性、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是防止暴力冲突的最佳工具。因此，我们鼓励秘书长努力保障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改革。我们赞扬建设和平委员会开展工作，发挥独特作用，支持世界各地的这些进程，尤其是非洲团结倡议、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强化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与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之间的谅解备忘录。这些进程积极促进性别平等并充分遵守国家主权原则。

近年来，冲突后果将某些国家拖入政治动荡、贫困、侵犯人权、损坏基础设施以及削弱机构的境地。刚摆脱冲突和战争的国家必须直面经济、基础设施、重建、消除贫困、创造就业、教育、公共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多重挑战。在这些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努力应侧重于向有关国家提供真正援助，以实现经济恢复。经济恢复应优先注重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人力资源开发。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也应特别重视加强教育方案。

至关重要的是，应协助处于冲突后阶段的国家根据各自情况制定重建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战略。正如安理会内我的许多同事所指出的那样，建设和平没有单一模式。在提供协助时，国际社会必须尊重各国国情，考虑到其看法和意见，因为此类国家最关心本国稳定和重建。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冲突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给予更多关注。

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的积极经验值得我们肯定，因为它们提供经验教训和良好做法的具体实际例证。非洲其他区域有些国家正在开始类似的进程，我们祝它们一切顺利。我们请各冲突中的行为体把本国最高利益放在首位，尽最大努力实现本国稳定与和平。

在这方面，我们重申，部署在世界各地的联合国各特派团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我们可以用来支持和配合受冲突影响国家和平进程的工具。因此，干预行动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建设和平。到该撤离的时候，必须与地方政府密切协作进行撤离，以有序和妥善界定的方式向地方 机构和部队移交责任和任务。

最后，我们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会对源自战争和冲突的挑战提出整体和全面的看法。建设和平委员会作为所有多边努力的协调者，无疑将加强各方之间的合作，这里的各方包括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会员国、国家当局、联合国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民间社会、妇女团体、青年组织、以及在适当情况下，还有私营部门和国家人权机构。

如果我们想以处理合作促进发展问题的广泛和包容的方式应对这些局势，那么这种协调就至关重要。在这方面，赤道几内亚认为，加强建设和平委

员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是一个优先事项。为此，我们强调，像今天这样的互动会议很有助益，建设和平委员会与安全理事会需要更频繁的相互联系。

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来本会议厅主持会议，我们感到荣幸。我还要欢迎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卡洛斯·霍姆斯·特鲁希略·加西亚先生、海地外交与宗教事务部长博奇·埃德蒙先生、以及我的兄弟般邻国东帝汶法律改革与议会事务部长菲德利斯·莱特·马加良伊斯先生。

我们感谢各位通报者——秘书长和我们来自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同事——并感谢主席国秘鲁召开本次重要会议。

维和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属于联合国可用来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最有效工具，但它们并不是魔杖。它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今天的许多冲突很棘手。此类特派团的撤离往往发生在保持和平仍然面临挑战之时——有些挑战可能会导致冲突复发。改善过渡管理对于为持久和平奠定基础至关重要。由于我们正在达尔富尔和海地进行过渡，今天的讨论很及时。我谨强调成功过渡的四个要点。

第一，我们必须改变对过渡的看法。决不可将过渡本身视为目的，而应将之视为在特派团关闭之前开始并延伸到特派团关闭之后的长期进程。在整个过渡期间，联合国没有哪个实体能够单独保持和平。我们必须及早进行综合规划，发挥联合国不同实体的优势，进行明确的分工，包括在特派团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之间分工。与联合国以外各行为体，包括区域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也至关重要。

第二，我们必须确认，国家自主权和主导权至高无上。建设和平必须因地制宜。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要进行成功的过渡，就必须加强地方和国家能力，以便在特派团所取得成果基础上再接再厉。相关国家行为体必须包容性地参与建设和平。国际支助可以发挥催化作用，但必须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的情况下，根据国家建设和平战略和需求予以提供。

第三，我们需要充足、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尤其是在特派团撤离之后。必须对建设和平相关官方发展援助进行更多投资。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应进一步探讨建设和平创新融资备选办法，包括开启国内财政资源。由印度尼西亚促成的建和委有关私营部门伙伴关系的第一个政策工作队的成果仍然有效。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秘书长关于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报告（S/2019/448）对南南合作为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作出的宝贵贡献给予了适当的肯定。南南合作使传统捐助方和国际金融机构得以通过三方安排参与其中。联合国高级领导层必须进一步探索南南合作的潜力。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可以开展联合项目，以支持建和委议程下的国家。发展、经济增长、提高生活质量以及消除贫困也应是我们工作的主要重点，以维护持久和平。

第四，我们应加强建和委支持安理会在过渡方面工作的咨询作用。在延长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任务期限之前，建和委一直在向安理会提供意见。这些最佳做法可在其他特派团中推广。建和委针对具体情况提出的适当咨询意见会确保安理会在制定任务授权时考虑到国家优先事项。

我们认为，秘书长有关各特派团的报告有改进的余地，可纳入把与特派团撤离有关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的建议以及确保负责任的过渡必须达到的关键基准。建和委应充分发挥其召集作用，通过与联合国所有相关实体和实地执行者进行积极接触，在整个过渡期间推动协调一致地建设和平。

最后，我国是最大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之一，依我们拙见，维和特派团或政治特派团取得成功的指标是，实地不再需要它，有关国家能够在本国领土上没有任何维和人员的情况下和平地发展。

莫里科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科特迪瓦赞扬秘鲁组织本次由该国外长内斯托尔·波波利西奥·巴尔达雷斯先生阁下主持的安全理事会通报会。我们祝贺他以堪称楷模的方式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们也欢迎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与会，并祝贺他作了高质量的通报，提出了各种切合实际的建议。

我欢迎哥伦比亚外长，并注意到他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所做的贡献。我也欢迎海地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和东帝汶立法改革和议会事务部长。

最后，我国代表团欢迎世界银行脆弱、冲突和暴力问题高级主任弗兰克·布斯凯先生和非洲开发银行过渡国家协调办公室主任耶罗·巴尔代赫先生作了非常详尽的通报。

加强各种伙伴关系以促进国家对过渡的自主权是我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因此，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也是我国在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期间可以分享的经验。在实地部署13年后，被许多观察员视为成功范例的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于2017年6月30日结束工作。科特迪瓦过渡进程的动力来自于我国对整个危机恢复和建设和平进程强有力的自主权，其特点是科特迪瓦政府与整个联合国系统密切合作，并通过与区域机构行为体和发展伙伴建立协调一致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此种合作。

这些因素使科特迪瓦政府能够自主处理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确定的优先过渡领域的事务，包括实现民族和解、增强社会凝聚力、建立安全和国防机构以确保我国的和平与稳定、加强法治以及保护和促进人权。

根据其经验，科特迪瓦强调，必须在被认为对过渡计划的成功执行至关重要的领域确定明确而具体的优先目标，同时考虑到可能导致危机重演的各种脆弱性。这些目标必须是应东道国政府的请求，在实地的联合国系统协作下，与所有其他相关国家行为体一起制定的。其目的是为过渡进程提出一个明确、共同的政治愿景。各方定期审查这一愿景，以评估其执行情况，并对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授权进行必要的调整。国家自主开展这一进程也是确保本国人口中的最弱势群体被纳入过渡计划的最佳方式，此种自主意识可促使各国家行为体与发展伙伴就优先事项达成共识。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就联合国行动的目标和理由进行良好沟通，对于在联合国、东道国政府和当地行为体之间建立必要的信任气氛至关重要，是过渡能否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有鉴于此，我谨强调联科行动调频电台的作用。该电台在科特迪瓦过渡进程中帮助促进了和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今天的“和平电台”前身就是这个调频台。

我国代表团还强调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以及联合国区域办事处的重要贡献。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就是一个例子，其调解和斡旋工作巩固了有关国家的过渡计划。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也发挥着关键作用，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支持作为实施过渡计划的一部分而采取的举措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科特迪瓦，政府实施的国家发展计划得到了双边和多边伙伴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这些计划促进了经济复苏，有助于消除贫困，使民众能更便利地获得教育和保健服务。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扬建设和平委员会与科特迪瓦政府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为资助优先建设和平项目调集了必要的资源。

任何过渡计划的成功都取决于多种因素，前提是，要有摆脱危机的真诚愿望，国家必须对过渡进程拥有强有力的自主权。这种所有权还必须得到与整个联合国系统、区域行为体以及双边和机构发展伙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的支持。随着各方将注意力转向其他转型期国家，科特迪瓦希望，这些国家的过渡计划能够受益于类似的国家自主权战略，得到与我国同等的支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海地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发言。

埃德蒙先生（海地）（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秘鲁邀请我参加本次题为“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重要会议。

我欣见，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指导我们讨论的概念说明（S/2019/540，附件）的质量很高。我也借此机会欢迎秘书长，感谢他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出色努力。

我们必须持续思考实现可持续和平的主要条件，同时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我们必须重点讨论本组织行动三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支柱，并顾及有关国家的真正问题、人民的基本需求和国家当局确定的优先事项。

因此，有必要努力协调一致，加强合作，并在各级开展新的合作与协调，以便恢复信任，最大限度地扩大长期发展机会。进行此类建设性交流，将使我们能够分享最佳做法，并找到改善受影响民众生活质量和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和平的措施。我强调，不实现长期发展，就不会有持久和平，零敲碎打的解决办法一向是靠不住的。

我赞赏本组织、特别是秘书长为促进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所做的努力。然而，我谨强调，必须充分了解海地共和国的局势。安理会成员自然会同意我的看法，即我国尚未摆脱武装冲突局势。在2004年部署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之后，在我国接着部署了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特派团（联海司法支助团）。根据安理会6月25日通过的第2476（2019）号决议，联海司法支助团将从10月16日起被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取代。

我再次表示欢迎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之外通过该决议，这是一项积极的事态发展，确认海地当局在联合国各特派团的支持下所作的努力。

自2004年以来，海地在安全与稳定方面特别困难的环境下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展，特别是在加强海地国家警察的能力方面。民主、正义、人权和法治领域也是如此。然而，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方面，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根据上述决议第1段为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指定的主要任务。

我不能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贫穷、饥饿、社会不平等和排斥的背景下是不能建立可持续和平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对该国安全与稳定的日益重要影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海地问题特设咨询小组在上一次访问我国后，基本上支持这一想法。该小组强调，必须更好地了解与海地不安全、犯罪、不稳定以及和平有关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联合国综合办事处必须尽力支持国家当局和民间社会的努力，以解决不信任、不安全和不稳定的根源，这些无疑是阻碍我国长期发展的真正障碍。

我已适当注意到安理会成员对从联海司法支助团到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这一过渡进程的明智意见和支持。安理会成员可以放心，共和国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先生阁下和共和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他们有责任改善海地人民的生活条件，并将为此而不遗余力。

海地代表团将继续呼吁建立能够处理有关国家所面临重大紧急情况的联合国特派团。就我国而言，我仅提及安全、粮食、环境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包括霍乱等问题。

请允许我强调我认为值得进一步注意的两个问题：第一，必须无条件和持续地为长期发展努力提供资金；第二，安全理事会与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之间必须在适当尊重各自职能和权力的基础上进行持续对话，以确保联合国进驻海地这样一个国家的作用是综合、平衡的，并配合本组织工作的三大支柱进行。

最后，我要指出，促进持久和平的愿望势必带来改善所有有关民众生活条件的愿望，同时要铭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口号：“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东帝汶法律改革和议会事务部长发言。

莱特·马加良伊斯先生（东帝汶）（以英语发言）：我代表我国政府和所有同胞向安全理事会致以热烈的敬意。我也衷心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秘鲁邀请我在这个与我国历史永远交织在一起的机构发言。

对东帝汶来说，这次讨论是及时的，因为我们在纪念安理会通过一个特别政治特派团——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授权进行联合国管理的全民协商二十周年，全民协商使我们得以行使自决。在我们表决独立之后，安理会授权设立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东帝汶过渡当局）。在东帝汶过渡当局之后，10年里设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特派团，最后于2012年设立了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联东综合团）。因此，我荣幸地从东道国的角度发言，并向安理会成员介绍关于伙伴关系和国家所主导过渡进程对成功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的重要性的一些看法。

我要借鉴我国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首先指出领导能力和自主权的重要性。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充分参与，就不可能拥有过渡进程的自主权，因而也不可能使人民成功地参与进来。在一个特派团的整个任期内，与各国政府和地方领导人进行定期、广泛和有意义的协商，而且随着一个特派团缩减活动而进一步加强这种协商，这对确保自主权至关重要。必须为各国政府提供空间，以确定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和撤离战略。在2012年9月20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我国前总理夏纳纳·古斯芒将过渡期间这种关系的性质强调如下：

> “在与联东综合团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咨商基础上，政府负责决定联合国在联东综合团撤出后的性质、活动和作用。”（S/2012/736，附件，第2页）

就我们而言，设立了一个高级别委员会，由东帝汶国和联东综合团的代表组成，负责起草一项联合过渡计划，以监测联东综合团活动的最后完成，包括移交进程。联合过渡计划的组成部分包括持续稳定、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在这些选举的基础上组建全国政府、确保反对派的民主空间、以及在过渡进程中取得进展，具体涉及已确定的其他方面，如警察与安全、法治、司法和人权、民主治理、以及经济发展要素，这些都需要特派团的具体协助。这些要素一经确认得到满足，我们国家领导人即决定，继续提供协助最好是通过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双边和其他多边伙伴，而不是维持和平特派团或政治特派团。

东帝汶领导层还提出一种创新的合作工作关系，以秘书长一位特使的形式来开展，该特使将根据东帝汶自己的战略发展计划，侧重于体制的加强和发展，而且特使也将是联系秘书长办公室的直接渠道。

安全理事会随后于2012年11月进行的访问证实，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切实进展，而且还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这表明在过渡期间可持续和平、民主治理、法治和社会经济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访问团的报告（S/2012/889）还确认，东帝汶对话者立场一致，他们要求终止联合国特派团，并阐述了他们对下阶段发展的愿景，而且还提议任命一名秘书长特使。

在联东综合团结束时，当地自主权、领导权和持续对话已成为促成特派团取得成功和持续撤离的一套原则。

我还要强调，为过渡和特派团撤离后阶段的发展努力提供资金对于保持和平至关重要。必须妥善协调官方发展援助，以便高效和有效支持撤离计划。顾问的部署应着重面向这些战略需求。

最后，尽管我们确实希望，在安理会审议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团和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等一些维和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即将进行的缩编和撤离时，我们的经验会有所助益，但我们大家从经验中

得知，一种办法确实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不存在任何快速解决办法。

必须找到适当的平衡，让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都发挥领导作用，力求制定综合撤离战略，这种战略应得到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支持，并得到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联合国区域委员会、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部门的持续参与，以保持来之不易的和平。

下午5时40分散会。